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Active Participation”: Xiangyang Path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Practice

Xiuting Sun

Xiangyang City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 Xiangyang, Hubei, 441000, China

Abstract

As a 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Xiangyang in Hubei Province has developed a distinctive approach to civil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This model, centered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driven b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supported by platform development. Drawing from Xiangyang's practices,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innovative measures, including the “Time Savings Book” volunteer incentive program, the “Xiangyu” market platform, and community-drive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outlines the “Xiangyang Model” of civil practice, which is grounded in value recogni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tangible outcomes,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1] This model not only ensures the normalization, integration into daily life, and sustainability of civil practice activities but also enhances grassroots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promotes socio-economic progress. It provides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insights for advancing civil practice initiatives nationwide.

Keywords

Civilized Practice; Incentive Mechanism; Platform Construc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Xiangyang Model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文明实践的襄阳路径与机制建构

孙修廷

襄阳市融媒体中心，中国·湖北 襄阳 441000

摘要

湖北省襄阳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新时代推动文明实践深化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一条以群众为主体、以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平台构建为支撑的文明实践路径。本文基于襄阳的具体实践，重点分析其通过“时间存折”志愿服务量化激励、“襄遇”集市多元化平台搭建，以及群众参与赋能基层治理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创新做法，系统总结出以价值认同为前提、以平台建设为关键、以实际发展成效为根本、以激活群众主体性为核心的文明实践“襄阳模式”。^[1]该模式不仅实现了文明实践活动的常态化、生活化与可持续发展，更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协同进步，为我国基层文明实践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借鉴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

文明实践；激励机制；平台构建；基层治理；襄阳模式

1 引言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重要载体，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它不仅是宣传普及党的创新理论的“广播站”，更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实践场”。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如何突破传统宣传教化模式的窠臼，真正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使其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创造者”乃至“受益者”，成为各地探索与实践的核心议题。

襄阳市，一座拥有逾 2800 年建城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赓续千年文脉的同时，亦面临着现代城市文明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时代考卷。近年来，襄阳市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创新勇气，将文明实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与治理肌理，尤其注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机制探索与实践创新，初步实现了群众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受益者—主导者—代言人”的角色跃迁。本文旨在依托襄阳多项具象化、可感知的基层实践案例，从微观机

【作者简介】孙修廷（1979—），男，中国湖北枣阳人，本科，新闻记者，从事文明创建、文明实践、媒体融合等研究。

制入手，宏观视野把握，深入探讨其如何通过系统性、制度化的设计，有效激发并持续维系群众的参与热情，最终实现文明实践的常态化、生活化与可持续发展，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襄阳模式”，以期为全国同类地区的文明实践工作提供镜鉴。

2 “时间存折”：量化激励与内生动力激活机制

志愿服务是文明实践的核心内容，然而“志愿活动一阵风”、“难以持续”等问题长期困扰基层。襄阳市南漳县卞和社区创新推出的“时间存折”制度，正是针对这些痛点，在志愿服务激励机制方面进行的一项深刻变革，其核心在于通过可量化、可累积、可兑换的机制设计，将无形的奉献转化为有形的价值认可，从而激活参与者持久的内生动力。^[2]

2.1 量化积累与多重激励：构建正向反馈闭环

“时间存折”机制的精妙之处在于其精细化的设计。它将志愿者提供的每一次服务，以“时间积分”的形式准确记录于专属的“存折”中，遵循“1小时服务=1积分”的明晰规则。这种量化记录使得志愿者的付出变得可见、可衡量，奠定了激励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积分并非止于数字，而是联通了一套多元化的激励回馈体系。积分既可兑换米面油、日常生活用品等实物奖励，满足基本物质需求；更可转化为层次丰富的精神荣誉激励：累计200分可获得社区慰问，500分由社区献花表彰，900分授予“优秀志愿者”牌匾，1500分则可由社区推荐参选市级“襄阳好人”等更高荣誉。这种物质与精神并重、短期与长期结合的多重激励，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向反馈闭环，显著增强了志愿者的获得感、成就感与荣誉感，使其付出得到即时且长期的社会认同。^[3]

2.2 全面推广与实效延伸：从“小存折”到“大治理”

“时间存折”的成功实践很快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可推广性。目前，该模式已在襄阳市所有的2911个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得到全面推广，累计发放“时间存折”超过110万张，记录的志愿服务总时长突破1400万小时，形成了庞大的志愿服务数据网络。其效能早已超越单纯的志愿服务记录，深度嵌入基层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它与“积分超市”模式相结合，成效尤为显著。以老河口市苏家河村为例，村民通过参与环境整治、遵守村规民约、践行文明行为等方式赚取积分，并凭积分在超市兑换商品。此举巧妙地将抽象的道德规范和文明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指南，极大地调动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实现了用“小积分”撬动“大治理”、用“小超市”带动“大文明”的治理升级，有效破解了农村环境维护难、陋习改变难等治理难题。

2.3 主体性回归与价值重塑：超越物质的深层意义

“时间存折”机制的深层价值，在于它促进了参与者，特别是特定群体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与社会角色的再确认。

对于许多退休老人、家庭主妇或闲暇时间较多的市民而言，它提供了一个重返社会舞台、贡献智慧力量的通道。例如，樊城区的一位退休教师李阿姨，在退休后一度感到失落与社会脱节。通过参与“时间存折”项目，她利用自己的教学特长在社区开设公益课堂，她的积分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她重新获得了社区的尊重和认可，找到了退休后的生活价值和情感归属。这个故事折射出“时间存折”远不止是一种管理工具，更是一种社会联结机制和精神赋能平台，它在促进老有所为、青有所励、凝聚社区共识、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深层作用，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4]

3 “襄遇”集市：多元平台与参与便捷化实践

即便有了激励，若参与渠道不畅、活动形式枯燥，群众参与仍难持续。襄阳市精准洞察到文明实践“不接地气”、“远离生活”的潜在风险，创造性打造了“襄遇”公益集市这一品牌项目，旨在构建一个“家门口”的、便捷高效的便民利民服务平台，让文明实践像逛集市一样自然、方便、有趣。^[5]

3.1 集成化服务与精准对接：构建“15分钟文明实践圈”

“襄遇”集市的核心优势在于其高度的集成化和精准化。它彻底改变了以往服务资源分散、供需错配的局面，依托成熟的“群众点单—中心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数字化运行机制，将政策咨询、健康义诊、小家电维修、法律援助、非遗文化体验、理发等数十项便民服务资源集中整合到一个流动的“集市”上。群众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像选择商品一样选择服务项目，实现了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匹配。这种模式将文明实践阵地从固定的站点延伸到居民生活的核心区域，形成了高效的“15分钟文明实践圈”，年均每个服务点服务群众超过2000人次，极大降低了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时间成本和空间门槛，使其真正融入日常生活的“最后一米”。^[6]

3.2 主题化运营与四季常新：保持文明实践的“新鲜度”

为避免群众产生审美疲劳，确保文明实践的吸引力和延续性，“襄遇”集市采用了主题化、IP化的运营策略。它结合中国传统节气、重要节日和本地民俗，精心策划了“襄遇有益”（春季聚焦公益服务与生态环保）、“襄遇有医”（夏季突出健康养生与义诊）、“襄遇有谊”（秋季强调邻里互助与文化联谊）、“襄遇有移”（冬季关注移风易俗与温暖过冬）等四季主题IP系列活动。每个主题下又设计丰富多彩的子活动，使得“襄遇”集市常办常新，始终保持对群众的吸引力。这种主题化运营不仅让文明实践活动更具仪式感和文化味，也使其与时节变换、群众生活节奏深度融合，确保了活动的持续生命力和影响力。^[7]

3.3 移动化拓展与场景融合：群众在哪，文明实践就到哪

为进一步突破物理空间限制，襄阳市推出了“移动实践站”概念，让“襄遇”集市真正流动起来。这些移动站点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商业街区、建筑工地等群众生产生活的第一线，根据场景特点提供定制化服务：在乡村，开展农技培训、农产品电商辅导；在商圈，进行诚信经营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工地，提供法律援助、安全知识普及。南漳县巡检镇将理论宣讲课堂直接搬到春意盎然的茶园中，宣讲员与茶农边劳作边交流，使党的创新理论在清新的茶香中“声”入人心。这种“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的移动化、场景化模式，实现了文明实践与群众生活、生产的“无缝对接”，使其不再是附加的任务，而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4 群众参与赋能发展与治理创新的实践成效

襄阳的文明实践并非孤立的文化活动，而是始终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紧密耦合、同频共振。群众广泛、深入的参与，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乡村转型、促进文明互鉴的实质性成效。〔8〕

4.1 优化营商环境，市民化身“城市代言人”

文明的程度是营商环境最直观的“软实力”。2020年，一个生动的案例见证了这种“软实力”如何转化为“硬投资”。一位来自外地的企业家在襄阳乘坐出租车时，司机师傅不仅服务热情周到，更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了襄阳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产业政策及营商环境，其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专业性给企业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增强了对襄阳的投资信心。最终，该企业决定投资5亿元，在襄阳建立高端智能手机显示屏生产线。这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正是千千万万参与文明实践、提升自身素养的襄阳市民的缩影。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成为了城市形象最真诚、最有力的“代言人”和“推销员”，构成了招商引资中无可替代的情感纽带和信任基础。

4.2 推动乡村转型，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在乡村层面，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直接赋能了治理创新与产业振兴。襄州区双沟镇梁咀村曾是一个因干群关系紧张而以上访频繁闻名的“问题村”。为彻底扭转局面，村“两委”以文明实践为抓手，一方面通过发展蔬菜合作社，让村民在集体经济壮大中看到实在利益；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红黑榜”、“黄金六条”村规民约等制度，将村民参与环境卫生、邻里互助、遵纪守法等行为纳入文明积分管理，与福利待遇、评先表模挂钩。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内生动力，实现了从“事不关己”到“人人负责”、从“怨声载道”到“同心协力”的转变。如今，梁咀村已成为“零上访村”，村集体年收入超过3000万元，实现了从“治理难点”到“治理样板”的华丽转身，生动诠释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深刻内涵。

4.3 文明与发展互促，形成良性循环

襄阳的实践深刻表明，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统一体。枣阳市袁寨村通过发展“稻虾共养”生态农业，让群众在绿色发展增收致富；保康县格栏坪村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让村民吃上“生态饭”、“旅游饭”；谷城县堰河村坚持走生态优先之路，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绿色产业蓬勃发展。在这超过700个村庄的成功实践中，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得以显现：文明实践提升了村民的文明素养和合作精神，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而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文明带来的好日子”，从而更加主动、自觉地维护文明成果、参与文明建设。这种“文明-发展-更文明”的良性循环，为乡村的全面振兴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9〕

5 经验与启示：构建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襄阳模式”

纵观襄阳的探索与实践，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套系统化、多维度、可持续的机制设计。从中可以总结出构建高效群众参与模式的四大核心要素：

5.1 价值认同是前提：建立精神与物质并重的回馈机制

单纯的行政动员或道德说教难以持久。必须建立一套能够让参与者感受到自身价值被看见、被尊重、被回馈的机制。“时间存折”的成功就在于它同时满足了参与者的物质需求（积分兑换）和精神需求（荣誉表彰、社会认可），实现了“助人”与“自助”的统一，从而在内心深处激发并维持了参与的热情。

5.2 平台建设是关键：打造开放、便捷、多元的实践载体

再好的理念也需要落地的载体。必须降低参与门槛，让群众想参与、能参与、方便参与。“襄遇”集市及其移动模式，通过集成化、精准化、主题化和移动化的设计，将文明实践打包成“惠民套餐”送到群众身边，变“要我来”为“我要来”，实现了平台与群众之间的“双向奔赴”。

5.3 发展赋能是根本：将文明实践与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文明实践不能“空对空”，必须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地方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当群众从参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看到了生活环境的改善、收入的增加、办事的方便，他们才会真正认同并持续参与。襄阳的案例表明，文明实践一旦与发展治理深度融合，就会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5.4 主体激活是核心：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这是“襄阳模式”的灵魂。政府角色应从“主导者”转向“引导者”、“赋能者”和“服务者”，充分信任群众

的智慧和创造力,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群众自己的问题。无论是“时间存折”的推广完善,还是“襄遇”集市的服务内容,都充分吸纳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正是这种对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才使得各项活动充满了活地气和生命力,使群众真正成为文明实践的“主人”^[10]。

6 结语

襄阳市以“时间存折”和“襄遇集市”等一系列创新实践为支点,撬动了千万市民参与文明实践的磅礴力量。其成功之处在于,它从未将文明实践视为一项孤立的政治任务或文化活动,而是将其作为重塑城市文明生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工程来谋划和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普通人的微小行动——一次志愿服务、一次遵守村规、一次热情导引——都得到了制度的珍视和社会的褒奖,最终汇聚成推动城市文明前行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合力。

“襄阳模式”所验证的,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平台构建为支撑、以实效为导向的文明实践可行路径。它为当前我国深入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特别是如何破解群众参与难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过实践检验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这不仅是一份出色的“襄阳答卷”,更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了富有启发的“襄阳智慧”,彰显了在新时代“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深层力量与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 [1] 襄阳文明网. 文明实践聚合力 千年古城焕新彩[EB/OL]. (2025-09-15).
- [2] 湖北文明网. 襄阳: 2025年“春锋十里 襄遇有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公益集市开市[EB/OL]. (2025-03-12).
- [3] 湖北文明网. 襄阳全市推广“时间存折”志愿服务 时长达1500小时可优先“评先表模”[EB/OL]. (2022-07-21).
- [4] 湖北文明网. “襄遇有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公益集市开市[EB/OL]. (2025-08-26).
- [5] 襄阳文明网. 樊城区牛首镇花园村: “农旅融合+文明实践”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EB/OL]. (2025-09-15).
- [6] 文明襄阳. 襄阳: “时间存折”激活一池春水[EB/OL]. (2023-06-30).
- [7] 湖北文明网. “襄遇有医”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公益集市今晚开市[EB/OL]. (2025-07-04).
- [8] 襄阳文明网. 从“陌邻”到“家人”——襄城檀溪湖社区党建“123工作法”蹚出基层治理新路子[EB/OL]. (2025-09-15).
- [9] 湖北文明网. 襄阳市推广南漳卞和社区志愿服务品牌“时间存折”让有德者更有“得”[EB/OL]. (2022-07-20).
- [10] 襄阳融媒体中心. 文明实践集市涌动雷锋温度 ——“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襄阳市2025年“春锋十里 襄遇有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公益集市侧记[EB/OL]. (2025-03-09).